



电影三十年

任仲伦 主编

走出伤痛

那些“斯”电影的日子

追逐的青春

“银幕教授”

半边天空别样红

画意与诗情

淘金记

第五代导演的萌芽

陈凯歌、张艺谋的创作变迁

崛起的城市，迷茫的年代

青春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姜文与“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挣扎中崛起

主旋律电影的力与美

叩门而入，应声而开

他把青春献给你

华语电影，中国制造

站在道岔的起点

宝岛灯，世纪新希望

大片时代，谁是“英雄”

院线放映高潮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动人的和弦

征战世界电影节

新“龟兔赛跑”

J909.2/12

2008



任仲伦
主编

电影三十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影三十年/任仲伦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26-2608-3

I. 电... II. 任... III. 电影史—中国—现代 IV. 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845 号

责任编辑 金 柯
助理编辑 徐思思 邓 越
装帧设计 柴 敏

电影三十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77 0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608-3/K·594

定价:26.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6511611

序

任仲伦

历史上总有一些年份,因其特殊作用或特殊影响而彪炳史册。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成为裹卷中国社会发展的澎湃大潮。中国电影也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从1978年开始,苍白的中国电影银幕再次有了血色,有了丰富的色彩。大量“文革”前拍摄的影片复映,唤醒了观众的影像记忆,更加唤醒了电影热情,同时也刺激了电影工作者的自信与勇气。尤其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澜壮阔,直接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如《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苦恼人的笑》,特别是以谢晋导演为代表的“反思电影”,更是从精神上呼应了中国改革的思想风暴,同时又以电影独特影响力与传播力,将社会变革的一点一滴吹进普通的百姓心灵。中国电影因此登上了一个巅峰。

电影再次恢复它原有的大众精神文化宠儿的地位。虽然1979年生产的影片只有五十多部,但电影观众人次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79亿。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喜盈门》,放映当年竟然有三亿多人次观看,创造了中国电影的奇迹。电影成了全民表达情感和思想最适合的载体。那个时候,电影院门前都人山人海。“文革”中八亿人看八部戏的日子已然过去,褪去了单一政治代言者身份的中国电影,渐渐展现出人性与艺术的魅力。“人性”的挖掘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的主题,主人公不再是完美无瑕,而变得有情有义、会哭会笑。

每一个观众都能从大银幕上感受到,我们的电影变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多种多样的类型片陡然盛行——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等等。各类型的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而《少林寺》在几角钱一张票的情况下还收入一亿票房。题材和语言上新的探索,让中国电影在八十年代,迎来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新浪潮”。

北京电影学院的78级,恐怕当初谁也料想不到,其中一批年轻人的名字日后将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摄影系的张艺谋、顾长卫、侯咏,导演系的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胡玫……他们摆脱了之前电影的旧俗陈规,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手法做出“不一样的电影”。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第五代”。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影人的力量,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革,正是电影人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开始用光影思考人生、用胶片记录情感。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感悟,让中国电影有了让世界尊敬的理由。

即使再汹涌的浪潮,也有退去的时候。电影的黄金岁月,在九十年代初开始褪色。电视机的日益普及和港台录像节目的登陆,让电影院的人流迅速退潮。这当然不是电视和录像的过错,更不是观众的过错,只是时代在提醒还为八十年代辉煌沾沾自喜的电影人,再次的变革,又将到来。

这一次,中国电影将面对世界。

随着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即展开。各制片厂的影片可以不再通过中影公司,而是自行向全国甚至海外的影院推销拍好的电影,票房开始成为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重要标准。包括上影厂在内的国内众多电影制片厂,也在此时纷纷改制成电影集团,集中人力财力打造大片。

每一次变革,就如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行船,需要指明方向的标杆。随着国门的开放,国外的优秀电影就成为了这一变革的标杆。

1994年11月,《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1996年,民营公司被允许进入电影圈,外国资金可注入电影院线。国内出现第一批五星级的影城,随之而来的是超大银幕、精良的影音设备、空调软椅以及小规模放映。此后,《狮子王》、《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席卷华夏,配合着新开张的五星级影城,再度掀起了看电影的热潮。

国外的商业大片,无疑拓展了中国电影人的视野,一直追求艺术性、独立性的第五代导演也意识到商业化为电影带来的生机。《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大灌篮》、《赤壁》、《画皮》等在票房上都取得了佳绩。冯小刚也以他标志性的“冯氏贺岁片”,取得了商业电影的巨大成功。中国内地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一同构筑起了“华语电影”在新时代的“中国话语”。

三十年间斗转星移,在国际电影市场中纵横捭阖的人们渐渐发现,中国电影已然不能孤立于世界而存在,合作将是大势所趋。合拍片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宠”。

这一点,上海无疑走在了中国的前列。这个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个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正酝酿着变革。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上海的合拍片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合拍的触角触及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欧洲、好莱坞。华语地区深厚的文化认同、开放对待世界的姿态,使得上海的合拍片为中国影坛带来一次次的惊喜。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走出了—个“V”字形的轨迹。有人在国际的舞台上屡获殊荣,有人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尊重。光影铭刻下了三十年发展的轨迹,光影也为我们展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我们今天满怀希冀地讨论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发展,就是以史为鉴,解读这段岁月的得失成败。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电影,恰如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正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坚定不移地开洋看世界。

(作者为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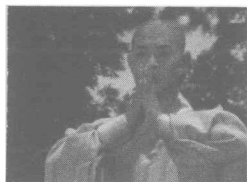


目 录

目 录

序	1
走出伤痕	1
那些“听”电影的日子	13
追逐的青春	25
“银幕教授”	35
半边天空别样红	43
画意与诗情	55
淘金记	65
第五代导演的萌芽	76
陈凯歌、张艺谋的创作变迁	90
崛起的城市,迷茫的年代	101
青春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116
姜文与《阳光灿烂的日子》	129
在挣扎中崛起	141
主旋律电影的力与美	155
叩门而入,应声而开	166
他把青春献给你	177





华语电影,中国制造	192
站在道路的起点	210
《宝莲灯》燃起新希望	221
大片时代,谁是“英雄”	232
院线放映奇闻录	247
动人的和弦	257
征战世界电影节	271
新“龟兔赛跑”	282
后记:值得铭记的光辉岁月	298

走出伤痕

1979年,无论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年头,电影史更不例外。那一年,一共生产了65部故事片。“文革”后的中国人开始努力正视伤口,关于人性的讨论重新开启,那一点一点宽松起来的舆论环境让中国人鼓起勇气努力接近那段历史,从感伤和迷茫的情绪中走向希望。银幕上的故事也大多触及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试图以轻巧的叙事隐喻深重的主题。这次电影革命的力度和深度足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



报晓春天

由李文化导演、李仁堂和谢芳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1979年摄制的《泪痕》描写“四人帮”被打倒后,革命干部与一个县里的帮派小集团斗争的故事。谢芳在影片里扮演原县委赵书记的妻子,因赵被害而变疯,含冤受屈多年,但她仍然执著地与“四人帮”余孽进行斗争。正如影片的片名,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泪痕。

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厂”)出品了由杨延晋、邓一民导演的《苦恼人的笑》。杨延晋出生于1945年,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73年进入上影厂,改学导演。《苦恼人的笑》中的傅彬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苦恼也是那时人们的普遍烦恼。“四人帮”专政下,人们都不敢说真话,被迫有着双重人格。傅彬是一个记者,他需要负责任地讲真

话，沉默、敷衍都是违背良知的。是顺应“四人帮”编造谎言欺骗人民，还是保持一个新闻记者的良心，说出真情？影片中的傅彬好像一位至亲密友为观众讲述他的痛苦，构成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苦恼”。

1979年，在西安，滕文骥、吴天明导演的《生活的颤音》也获得了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影片奖。滕文骥回忆道：“在文艺界的一股强大暖风的吹动下，我提笔写了剧本《生活的颤音》。当领导将影片拍摄的任务交给我和吴天明同志时，我们真有些胆怯。直到年初听了胡耀邦同志在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才壮了胆子，决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扎扎实实地干下去。”片子以“四五”运动为背景，通过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郑长河和他的女朋友徐珊珊的遭遇，表现了亿万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控诉。“在艺术处理上，我注意音乐故事片的特点，以郑长河创作并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抹去吧，眼角的泪》贯穿全片，并采用了回忆、幻觉等手法，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影片的主题。”

1979年北影厂还出品了一部重要电影——《小花》，该片后来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小花》改编自自前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小说主要描写的是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如果按照以前的思路拍，可能又是一部军事片。然而导演张铮决心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花大力气改编了小说，影片的主创认为：“调动那么多部队拍战争场面，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为什么不试试其他角度？”最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影片应着力表现人物命运，而非战略思想。当时，刘晓庆被从四川借来，唐国强同样很年轻，而陈冲还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满18岁。谁也不曾想到，一部影片就催生了之后红透中国的几位巨星。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伴随影片的上映，也红遍大江南北。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为影片最终定名《小花》，钟老说：“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1979年的12月寒冬，上海的《电影故事》杂志以“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为题，报道了电影工作者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情况，这距离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已经整整过去了19年。正是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文艺工作走过严冬，迈入春天。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大会祝辞中号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话给代表们极大的鼓舞和动力，很多导演、艺术家所积压的创作激情被讲话激发了出来。老剧作家于伶正在修改剧本《开天辟地》，导演陈鲤庭着手准备《大风歌》，时年 69 岁的导演汤晓丹筹备《淝水之战》。

1979 年 10 月 31 日下午，上海代表团导演吴永刚、刘琼和演员张瑞芳、韩非前往京西宾馆看望香港电影代表团导演李萍倩、演员吴楚帆和夏梦。一见面，吴永刚和李萍倩热泪盈眶、紧紧拥抱。他们从二十年代就在一起工作，“四人帮”使他们十几年不能相见，旧友重逢已是两鬓如霜。

11 月 2 日下午，王丹凤从宁波外景地乘飞机赶到北京参加大会。正在拍摄《海外赤子》的秦怡从珠影赶来，在北影拍摄《李四光》的孙道临和张瑞芳、向梅都到了。二十年代活跃于影坛的电影演员宣景琳和吴茵也到会了。“文革”期间，他们都受到重重磨难，有的人甚至被扫地出门。这次团聚，大家心情分外激动。宣景琳说：“我们幸存下来不容易啊！”吴茵说：“我们死不了，我们还不服老！我还要学写东西呢！”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两位影坛前辈，摄影家吴印咸和美术片大师万籟天见面时握手畅叙阔别之情，对于国产片都想出点力气。

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厂”）代表中最出挑的要数滕文骥，他虽是 68 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但当时他并未真正学到东西。他目睹学院毕业生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改行的改行、等待的等待，许多年过四十的同学至今尚未拍过片子，他强烈呼吁摄影能为年轻人多创造一些条件。

峨眉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厂”）来了八位代表，其中有老导演叶明和演员李亚林。会上，李亚林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老师马精武见面，久久握手、亲切交谈。在总参招待所里，八一电影制片厂（简称“八一厂”）的代表——电影导演王苹、严寄洲和演员田华、王晓棠等，还有编剧王愿坚、黄宗江、陆柱国，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邓小平的祝辞。“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

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大家都对这段话深有感触。

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厂”)的文代会代表有王家乙、于彦夫、严恭、浦克、郭振清、梁音和宋晓英。演员郭振清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衡量我们电影工作的好坏标准。我们一定要坚决以对‘四化’是否有利为标准,多出影片、出好影片,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电影八十年代的辉煌篇章逐渐开启。

从“第三代”到“第四代”

杨延晋在《苦恼人的笑》中一展才华后,1981年拍摄了一部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小街》。影片主题歌——“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至今仍

在传唱。

在《小街》文学剧本的卷首,作者有这样一句题词:“繁华的大马路是由无数条小街汇集而成的。”表面看来,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仔细咀嚼,却蕴含着作者的深思。影片《小街》就是动乱时代中无数小街的缩影,正是这一条条小街上的故事构建了中国那个时代。女主角张瑜在当年的《电影故事》杂志上谈道:“我要从十几岁演到二十几岁,而且由于十年浩劫,俞受尽了歧视、摧残,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比如:戏的前半段,俞被人剪去发辫,女扮男装。这不是一



《小街》海报

般的由于淘气顽皮而装成男孩，却是被迫害、被凌辱的象征。”男主角郭凯敏则说：“当我一接到《小街》的剧本后，就被剧中主人公的命运吸引住了……但再细细体会角色，却又感到很难演。一是自己没经历十年浩劫的场面（那时只有七八岁，姥姥不让出去）；二是夏和俞的感情都是内向的，比较难演好。”两位演员认真揣摩角色，终于让《小街》的故事牵动了全中国观众的心。

“影以载道”的理想贯穿中国电影史。对于“文革”的反思渐渐走向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住房问题是八十年代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其中交织着种种弊端。《邻居》拍于1981年，焦点就对准了这个敏感问题。导演郑洞天承认自己当时就住在一所高校的宿舍里，感同身受的生活催生了这部针砭时弊的电影。《邻居》里的筒子楼，现在已经化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其尴尬之处就在于那种既公开又独立的集体化家庭生活模式。各家各户都把灶火摆在门前，个人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当时《邻居》的剧本却辗转了四个电影制片厂，谁都不敢拍。影片成本23万人民币，创作人员都是义务劳动，钱都花在了制作上。也许这也是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放在现在几乎不可想象。关于影片的真实引发了很多课题。也许是因为选材足够尖锐，并且通过分房问题触到了深层的人际关系，也触及了体制的问题，影片后来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导演更放言：“这就是生活，去看吧！”后来，郑洞天拍摄了《鸳鸯楼》，反映城市大龄青年婚姻状况，也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同时，张暖忻的《沙鸥》以及《见习律师》等影片的出现，使得“纪实美学”的电影思潮一度大热。

1981年，谢铁骊、陈怀皑导演了《知音》。谢铁骊，中国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1925年生，1963年曾经执导过《早春二月》，那是一部忧郁的、哀婉的、诗性风格的影片。谢铁骊认为中国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是他的艺术宗旨。“文革”期间，他因无法忍受“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曾秉笔上书毛泽东，直抒不满，成为当年的“政治事件”，那时他是准备好了被打入“另册”的，甚至，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时隔多年，《知音》借小凤仙和蔡锷的爱情故事再圆谢铁骊的电影梦想。影片获得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剪辑奖、1982年第五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歌《知音》(王酩作曲)红遍全中国。张瑜和王心刚也因此片赢得了大量影迷的追捧。1983年,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改编自张天翼的小说。他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对中国父母们望子成龙而儿女又不争气所酿成的种种悲剧给予艺术上的解惑。作家梁晓声评价这部影片说:“影片可以拍得特别凄切悲苦,但他没那么处理。在艺术上,谢铁骊是一个欣赏含蓄的人,也是一位要求含蓄的导演。”

第四代导演中的翘楚——吴贻弓在当时推出了《巴山夜雨》。影片以长江上的一艘夜航船为载体,船上坐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诗人秋石、负责押送他的两名公安、停职的历史老师、怕事的京剧演员、祭子的老婆婆、为父抵债卖身远嫁的农村姑娘和工人小伙子。江上一夜,人间十年,《巴山夜雨》中没有反派,没有英雄,只是把人民十年中所受的苦难压缩在几十分钟的叙事中,诗意地表达了反思的情绪。

继《巴山夜雨》后,吴贻弓于1982年执导了《城南旧事》,为中国的



《巴山夜雨》剧照

诗化电影创造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影片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情感线索，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在离情别绪中讲着三个似乎互不相关的故事。影片的诗意和唯美、散文化的结构似乎信手拈来，却又浑然天成，导演吴贻弓也将这部作品看作自己得意之作。《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 1960 年出版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洋溢着缅怀旧日繁华的伤感情绪。虽然影片本身不直接反映某种政治内容，但当时改编一部台湾作品来表现“淡淡的乡愁”，表现那种既抽象又具体的恋乡情愫，还是别有意味的。日本影评家佐藤忠男在《中国电影百年》一书中，论及《城南旧事》也不吝赞美之辞，他写道：“整个故事是以少女时代的回忆形式展开的，甚至连我们这些外国人，都被引发了乡愁。这部佳作使我深深地沉浸在伤感之中。”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还有那首清雅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吕其明的配乐和李叔同的词为影片构建了无处不在的诗意气氛。这部诗意的电影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以费穆为代表的中国诗化电影的前缘再续，而影片所流露的伤感的气氛，更具备一种使人的心灵变得柔弱的力量，其后隐藏着的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稳重的风格，这种气质正是中国电影久违的语言。

1984 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了影片《人生》。影片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教师想进城施展才华，却在盛行“走后门”的社会处处碰壁的故事。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天明的电影也直面当下社会的症结，在影片中流露出受害者的伤感。1987 年，已做了几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又执导了一部轰动中外电影界的影片《老井》，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北方贫瘠山村生活风貌的影片。为解决老井村缺水的问题，回乡知识青年孙旺泉带领村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出了盼望已久的深水井。在影片中，吴天明大胆启用干摄影的张艺谋出演男主角孙旺泉，人们都担心不会成功，但吴天明运用他高超的导演技能挖掘演员的潜在素质，成功地拍摄了《老井》，并于 1988 年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第十一届百花奖故事片奖、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等。

总的来说,中国的第三代导演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创作,第四代导演在“文革”后恢复或者开始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他们都曾经历过彷徨无助的时代,有着认真而坚忍不拔的特质。恢复创作之初,他们对应该拍摄怎样的电影有过迷惘,而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批判“文革”,当然他们都能把握好尺度,略带感伤的气质可以看作第四代导演的集体标签。

谢晋:林中的第一声鸟叫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程中,谢晋这个名字陪伴了人们六十年,他是真正跨越时代的伟大导演。八十年代,年过半百的谢晋真正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有一句话很有说服力,那个时代,“谢晋的高度就是中国电影的高度”。

谢晋对于题材的选择常常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他习惯于走在时代前半步,故而每部片子都要“受难”。他坎坷的电影历程形成了中国影坛独有的“谢晋现象”。《女篮5号》刚拍完就被人指责搞“金牌主义”;《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与琼花的爱情戏被要求删剪;《舞台姐妹》被批为“人性论”,原先的结尾有句耐人寻味的对话“今后应该做怎样的人,演怎样的戏”后来被改为“今后要做革命的人,演革命的戏”;《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在牺牲前交代还债的情节,被人指责“有损解放军形象”……《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曾因针砭时弊而遭到过种种非议。回顾这一段电影史,不难看出,谢晋的成功也正在于此,总能成为林中的第一声鸟叫。

进入八十年代的第一部作品《天云山传奇》,获得中国第一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美术奖,同时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几乎囊括全国所有的电影重要奖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文革”的电影相当流行,但涉及“反右”斗争的影片却很少。谢晋回忆,被后人视为“伤痕电影”经典的《天云山传奇》首映时,影片结束了差不多一分多钟,才响起掌声,人们心情沉重。谢晋在《对〈天云山传奇〉的理解和导演这部影片的设想》一文中阐述道:

《天云山传奇》剧本基础好,打破框框,颇具特色,因而读来十分感人。作者写了三个女性的不同性格和风貌……从样式来讲,这是部带有悲剧色彩的抒情正剧。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家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家看(大意)。我考虑,把剧中的政治事件适当地推后些,力求把人物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表达得深一些。

而如何在银幕上表达三条线索以及复杂的人物内心独白,谢晋思考得最多,他希望自己的电影是深刻并美好的。

而1982年,谢晋在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的支持下,拍摄而成的《牧马人》则更有深度。一个右派分子被下放到牧场改造,究竟此刻该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还是继续留下来,这个问题沉重而艰辛,是知识分子在遭遇不公平待遇后面对祖国的集体困惑。1984年的《高山下的花环》,谢晋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批判“文革”的层面上,而继续深入,探讨体制上的弊端。和《牧马人》中的男主角一样,这个胆怯的军人最后在伟大的精神感召下,终于成了一位出色的爱国者。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当属1986年的《芙蓉镇》。影片描写了一个小镇上的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十几年中的升沉变迁,向人们展示了小人物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踉跄足迹。影片中,秦叔田(姜文扮演)在和胡玉音(刘晓庆扮演)一起扫街时,秦叔田教胡玉音跳华尔兹的镜头,给无数观众的心灵以极大的震动。谢晋用几个小人物的经历完成了对“四清”、“反右”、“文革”等历史问题的反思,堪称同类电影的翘楚。《芙蓉镇》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也捧红了刘晓庆和姜文,使他们一跃成为国内影坛数一数二的人物。当时,刘晓庆已经拍过《四渡赤水》、《同志感谢你》、《春歌》、《小花》等影片,小有名气。可谢晋在开拍《芙蓉镇》时,并不想找刘晓庆来演主角胡玉音。是刘晓庆给谢晋连发了四封信和电报,最终打动了谢晋。

1988年的《电影故事》第九期描述了《芙蓉镇》在第二十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放映时的场景。文章写道:“1800个座位的大剧